

LIANGQICHAO LUN ZHONGGUO WENXUE



梁启超论中国文学

梁启超 著

梁启超论中国文学

梁启超 著



创于1897

2012年·北京

目 录

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	1
-----------------	---

古歌谣及乐府

序论	2
----------	---

第一章 秦以前之歌谣及其真伪	5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二章 两汉歌谣	18
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章 汉魏乐府	29
----------------	----

周秦时代之美文	97
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一章 诗经之篇数及其结集	97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二章 《诗经》的年代	105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汉魏时代之美文	107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 建安以前汉诗	107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附 全汉诗种类篇数及其作者年代真伪表 葛天民 ...	148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汉魏乐府及其类似之作品	171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乐府之前驱	171
-------------	-----

唐宋时代之美文	186
---------------	-----

词之起源	186
------------	-----

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191

陶渊明 273

 自序 275

 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 276

 陶渊明年谱 300

 陶集考证 328

 附 陶集私定本 340

情圣杜甫 345

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

（据《饮冰室合集》专集第 16 册改排）

古歌谣及乐府

序 论

韵文之兴，当以民间歌谣为最先。歌谣是不会做诗的人（最少也不是专门诗家的人）将自己一瞬间的情感，用极简短极自然的音节表现出来，并无意要他流传。因为这种天籁与人类好美性最相契合，所以好的歌谣，能令人人传诵，历几千年不废。其感人之深，有时还驾专门诗家的诗而上之。

诗和歌谣最显著的分别，歌谣的字句音节是新定的，或多或少，或长或短，都是随一时情感所至，尽量发泄，发泄完便戛然而止。诗呢，无论四言、五言、七言，乃至楚骚体，最少也有略固定的字数、句法和调法，所以词胜于意的地方多少总不能免。简单说，好歌谣纯属自然美，好诗便要加上人功的美。

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只要歌谣不要诗，因为人类的好美性决不能以天然的自满足，对于自然美加上些人工，又是别一种风味的美。譬如美的璞玉，经琢磨雕饰而更美；美的花卉，经栽植布置而更美。原样的璞玉、花卉，无论美到怎么样，总是单调的，没有多少变化发展。人工的琢磨雕饰栽植布置，可以各式各样日新月异而岁不同。诗的命运比歌谣悠长，境土比歌谣广阔，都为此故。后代

的诗，虽与歌谣画然异体，然歌谣总是诗的前驱。一时代的歌谣往往与其诗有密切的影响，所以歌谣在韵文界的地位，洽文学史的人首当承认。

歌谣自然是用来唱的，但严格论之，歌与谣又自有别。《诗经·魏风·园有桃》篇：“我歌且谣。”《毛传》云：“合乐曰歌，徒歌曰谣。”然则有乐谱者谓之歌，无者谓之谣。虽然，人类必先有歌而后有乐，凡歌没有不先自徒歌起者。及专门音乐家出，乃取古代或现代有名的歌谣按制成谱，于是乎有合乐之歌，则后世所谓乐府也。

诗并不是一定用来唱的，“不歌而诵”的也是诗之一体。但音乐发达的时代，好的诗多半被采入乐，几乎有诗乐合一之观。《史记》说：“《诗》三百篇，孔子皆弦而歌之，以求合《韶》、《武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音。”大抵三百篇里头，除三《颂》或者是专为协乐而作诗之外，其余十五《国风》多半是各地“徒歌”的民谣；二《雅》则诗人所作“不歌而诵”的诗，自孔子以后，却全部变成乐府了，后世乐府，其成立发达的次序，大概也是一样。

乐府之名，起于西汉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：“自孝武立乐府（官名）而采歌谣，于是有代、赵之讴，秦、楚之风，皆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。”这几句话叙乐府来历，大概是不错的。但有当注意的一点，当时是采歌谣以入乐府，并非先有乐府而后制歌谣。大抵汉代乐府可大别为二类：其一，《郊祀》、《房中》诸歌，歌词与乐谱同时并制，性质和《诗经》的三《颂》略同；其二，即乐府所采之民谣，其中大半是“徒歌”，而乐官被之以音乐。《铙歌鼓吹曲》之《朱鹭》、《思悲翁》……等十八调，《横吹曲》之《陇头》、《折杨柳》……《相和歌辞》之《鸡鸣》、《乌生八九子》、《陌上桑》……等皆是也（看

第三章),性质和《诗经》的十五《国风》略同。汉乐府属于第二类者盖十而七八,此类乐府,大率采各地方之诗,而还被以各地方之乐^①,但后来有其诗而亡其谱,音节之异同,久已无考了。

汉代乐府,谅来都是能唱的(最少也可以徒歌),所以和普通的诗可以划然分出界限。魏晋以后,用乐府的调名来做五言诗的题目,虽号称乐府,已经和“不歌而诵”的诗没有分别了,此如《三百篇》与乐相丽,汉以后的四言诗便与乐相离;宋词与乐相丽,元明词便与乐相离;元明曲与乐相丽,近人曲便与乐相离,虽时代嬗变不得不然,然而名实之间,却不可含糊看过。要之乐府一体,自西汉中叶始出现,至东汉末年而消沉,乐府在汉代文学史的地位,恰如诗之在唐,词之在宋,确为一时代之代表产物。过此以往,虽继续摹仿者不少,价值却完全两样了。

南北朝以降,摹仿汉乐府的作品,已并吞在五言诗范围中,但其时却另有一种类似乐府之短歌谣,其格调和当时诗家的诗大有不同。把几个时代这类作品比而观之,可以见出数百年间平民文学变迁的实况。

本卷所叙录,以汉乐府为中坚,而上溯古歌谣以穷其源,下附南北朝短调杂曲以竟其委,魏晋后用乐府调名标题诸作,则各以归诸其时代之诗,不复在此论列。

^① 《汉书·艺文志·诗赋略》载,有“《吴楚汝南歌诗》十五篇,《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》九篇,《邯郸河间歌诗》四篇,《齐郑歌诗》四篇,《淮南歌诗》四篇,《左冯翊秦歌诗》三篇,《京兆尹秦歌诗》五篇,《河东蒲反歌诗》一篇,《阳歌诗》四篇,《河南周歌诗》七篇,《河南周歌诗声曲折》七篇,《周谣歌诗》七十五篇,《周谣歌诗声曲折》七十五篇”。可见当时乐府,以地为别。又别有所谓“声曲折”者,则乐谱也。

第一章 秦以前之歌谣及其真伪

歌谣既为韵文中最早产生者，则其起源自当甚古。质而言之，远在有史以前，半开化时代，一切文学美术作品没有，歌谣便已先有。试看现在苗子，连文字都没有，却有不少的歌谣。我族亦何独不然？虽然，古歌谣发达虽甚早，传留却甚难，不著竹帛，口口相传，无论传诵如何广远，终久总要遗失。何况歌谣之为物，本是当时之人自写其实感，社会状况变迁，情感的内容亦随而变。甲时代人极有趣的作品，乙时代人听起来或者索然无味。现代欧美一时流行的曲子，过了几年便无人过问者往往而有，况于一千几百年前的古歌？想他流传不坠，谈何容易。现在古书中传下来这类古董，也有好十几件，我们虽甚珍惜，却有审查真伪的必要。

最古之歌谣见于经书者，有帝舜与皋陶唱和的歌：

股肱起哉，元首喜哉，百工熙哉。

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。

元首丛脞哉，股肱惰哉，万事堕哉。

上歌见《尚书·皋陶谟》，在我们未能把《皋陶谟》的编辑时代从新考定以前，只得相信他是真。那么，这三首歌便是中国最古的古歌，距今约四五千年了。但即令是真，也不过君臣谈话之间，用韵语互相劝勉，在情感的文学上，当然没有什么价值。

《尚书大传》也载有性质略同的三首歌：

卿云烂兮， 漫漫兮，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。

明明上天，烂然星陈，日月光华，弘于一人。

日月有常，星辰有行。四时顺经，万姓允诚。于予论乐，配天之灵，迁于贤善，莫不咸听。 乎鼓之，轩乎舞之。菁华已竭，褰裳去之。

这三首歌，就诗论诗，总还算好。第一首且已采作国歌了，但以文学史的眼光子细观察，这诗的字法、句法、音节，不独非三代前所有，也还不是春秋战国时所有，显然是汉人作品。《尚书大传》相传是伏生作，真否已属问题，就算是真，伏生已是汉初人了。据说第一首是帝舜倡，第二首是八伯和，第三首是舜载歌，显是依傍《皋陶谟》那三首造出来的无疑。

此外还有什么帝尧时代的《击壤歌》，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；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。帝力于我何有哉！”见晋皇甫谧的《帝王世纪》；什么帝舜的《南风歌》，“南风之熏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；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”见晋王肃的伪《家语》。娘家的来历先自靠不住，更无考证之余地了。伪《列子》有尧时《康衢歌》四句，全钞《诗经》。此外各书还有尧舜时歌数篇，皆无征引之价值。

《离骚》说：“启九辩与九歌兮，夏康娱以自纵，不顾难以图后兮，五子用失乎家巷。”据此，则夏代的歌，战国时或尚有传闻，但其辞当已久佚了。枚瓚伪《古文尚书·五子之歌》篇因此造出五首诗来，近人久已知其伪，不必辨了。要之夏代歌诗，一首无存。无已，则《孟子》书中有晏子所引夏谚：“吾王不游，吾何以休；吾王不豫，吾何以助；一游一豫，为诸侯度。”或算得是夏代仅存的韵语。《孟子》这书固然不假，但他根据何经何典，是否春秋战国时

人依托之作，我们却未敢轻下判断。

殷代歌诗，传者依然很少，《商颂》五篇，是否有殷遗文在内，抑全属周时宋人之作，已属疑问。此外见于《史记》者有殷末周初之歌两首：

箕子《过殷墟歌》：

《史记·宋世家》：“箕子朝周，过故殷墟，感官室毁坏，生禾黍，箕子伤之，欲哭则不可，欲泣为其近妇人，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。……殷民闻之，皆为流涕。”

麦秀渐渐兮，禾黍油油。彼狡童兮，不与我好兮。（司马迁释之曰：“所谓狡童者，纣也。”）

伯夷《采薇歌》：

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：武王已平殷乱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、叔齐耻之，义不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，作歌，其辞曰：

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黄农虞夏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？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！

《史记》固然是最有价值的古史，但所记三代前事，很多令人怀疑之处。这两首歌我们不敢说一定就是原文，但周初诗歌，《三百篇》著录已不少，其有流传之可能性甚明，然则这两首歌，大概也当可信。歌中文辞之优美，意味之浓厚，不待我赞叹了。

西周和春秋初期的歌诗，当以《三百篇》为代表，此处不再说了。其次，则《左传》所载零碎歌谣及其他韵语还不少，今摘录若干章以觐沿革：

周辛甲《虞箴》（襄四年）：

茫茫禹迹，画为九州，经启九道。民有寝、庙，兽有茂草，各有攸处，德用不扰。在帝夷羿，冒于原兽，亡（同忘）其国恤，而思其麇牡。武不可重，用不恢于夏家。兽臣司原，敢告仆夫。

辛甲乃周武王时太史，《左传》不过追述其语。

宋正考父鼎铭（昭七年）：

一命而偻，再命而伋，三命而俯，循墙而走，亦莫余敢侮。
于是，粥于是，以糊予口。

正考父为孔子远祖，在宋佐戴、武、宣三公，盖□□时人，《左传》追述之。

上两篇本非歌谣，因其为韵文之一体，见于《左传》，故类录之。

鲁羽父引周谚（隐十一年）：

山有木，工则度之。宾有礼，主则择之。

晋士 引谚（闵元年）：

心苟无瑕，何恤乎无家。

晋士 赋(僖五年)：

狐裘蒙茸，一国三公，吾谁适从？

晋卜偃引童谣(僖五年)：

丙之辰，龙尾伏辰，均服振振，取号之旂。鹳之奔奔，天策焯焯，火中成军，虢公其奔。

宋筑城者嘲华元讴(宣二年)：

睥其目，蟠其腹，弃甲而复。于思于思，同膺，弃甲复来。

鲁声伯梦中闻歌(成十七年)：

济垣之水，赠我以琼瑰。归乎归乎，琼瑰盈吾怀乎。

鲁人为臧纘诵(襄四年)：

臧之狐裘，败我于狐骀。我君小子，侏儒是使。侏儒侏儒，使我败于邾。

郑人为子产诵(襄三十年)：

取我衣冠而褚之，取我田畴而伍之，孰杀子产，吾其与之。（上子产初执政时所歌）

我有子弟，子产诲之，我有田畴，子产殖之，子产而死，谁其嗣之。（上执政三年后所歌）

鲁人为南蒯歌（昭十二年）：

我有圃，生之乎！从我者子乎，去我者鄙乎，倍其邻者耻乎！已乎已乎，非吾党之士乎！

鲁 鹄谣（昭二十五年）：

 之鹄之，公出辱之。 鹄之羽，公在外野，往馈之马。
 鹄跼跼，公在乾侯，征褰与褊。 鹄之巢，远哉遥遥。稠父丧劳，宋父以骄。 鹄 鹄，往歌来哭。

吴申叔仪歌（哀十三年）：

佩玉粲兮，余无所系之。旨酒一盛兮，余与褐之父睨之。

卫侯梦浑良夫噪（哀十七年）：

登此昆吾之虚，绵绵生之瓜。余为浑良夫，叫天无辜。

上所录并未完备，不过把文学成分较多的摘出来便了。内中

最有趣的是嘲华元讴，一群平民一面做工，一面唱歌，把对面的人面目写得活现。最奇诡的是浑良夫噪，一个冤鬼被发跳掷的情状，在纸上飒飒有声。

上所录有许多要参考当时的本事，可看《左传》原文，今不赘录。

我们读这些谣谚，当然会感觉他和《三百篇》风格不同，尤其是后半期——襄、昭、定、哀间的作品，句法是长短句较多，格调多轻俊，藻泽加浓厚，虽彼此文体本不从同，亦可以见诗风变迁之一斑了。（《三百篇》中惟“胡为乎株林……”一章与《左传》诸歌谣最相似，此章乃陈灵公时诗，《三百篇》中最晚的一篇了。）

周代歌谣见于《左传》以外者尚不少，但真伪问题却大半要当心了，内中时代最早的则所谓□□西王母《白云谣》：

白云在天，山陵自出。道里悠远，山川间之。将子无死，尚复能来。

这首谣见《穆天子传》，说是周穆王上昆仑山见西王母，临归，王母觞之于瑶池，唱这谣送他，穆王还有和章（恕不录）。《穆天子传》这部书，乃晋太康三年在汲县魏安厘王冢中，与《竹书纪年》同时出土，书之真伪，问题很杂，若认为全伪，那么，便是晋人手笔；若认为真，便是战国人所记，可算中国最古的小说。若谓西周时的穆王真有此事真有此诗，未免痴人前说不得梦了。诗却甚佳，但和《三百篇》风格画然不同，细读自能辨。

次则所谓齐宁戚《饭牛歌》：

南山矸，白石烂，生不逢尧与舜禅。短布单衣适至骭，从
昏饭牛薄夜半，长夜漫漫何时旦！

这首诗始见于《史记集解》引应劭，云出《三齐记》。宁戚是管仲同时人，此诗若真，便是孔子前一百多年的作品了。但我们当注意者，《吕氏春秋·举难》篇、《淮南子·道应》篇，并详载宁戚饭牛事，但皆仅言其“扣牛角而歌”，并没有载他的歌词。而《后汉书·马融传》注引《说苑》则云：“宁戚饭牛于康衢，击车辐而歌硕鼠。”（今本作歌顾，见字形近而讹。）高诱《吕氏春秋》注亦云：“歌硕鼠也。”并将《诗经·硕鼠》篇全文录入注中。所歌是否必为硕鼠，虽未确知，但南山白石之篇为刘向、高诱所未见，总算有确实反证。《三齐记》已佚，不知何人所撰，恐是晚汉依托之作耳。（又《艺文类聚》及《文选·嘯赋》李善注又各载有《宁戚歌》一首，与此文不同。《文选注》那首末句云：“吾将与尔适楚国”，似是因原有歌硕鼠之传说，乃将《硕鼠》篇“逝将去汝，适彼乐国”敷衍成文。《艺文类聚》那首，前四句和《三齐记》那首大同小异。末句云：“吾将舍汝相齐国”，似是将那两首改头换面凑成。要之，三首皆不可信也。）此诗就诗论诗，原是很好的，若果真，那么便是七言诗之祖。但我敢说这种诗格，决非春秋时所有，摆在东汉乐府里头，倒还算上乘。（其实宁戚饭牛事便根本不可信。布衣立谈取卿相，乃战国风气，春秋初期决无有此事，本是战国游说之士造出来。诗则东汉末伪中生伪。）

其次则所谓秦百里奚妻之歌：

百里奚，五羊皮，忆别时，烹伏雌，炊粳糜。今日富贵，忘我为。

此诗见应劭《风俗通》(劭,东汉末人。)百里奚为秦穆公时人,诗若真,也是春秋初期作品了。但奚以五羊之皮要穆公,本是战国人造的谣言,孟子已经辩过。这诗句法,颇似汉《郊祀歌》,当属汉人依托,诗亦寡味。

其次则伍子胥自楚亡命时,渔人救之,作歌:

日月昭昭乎侵已驰,与子期乎芦之漪。

日已夕兮,余心伤悲。月已驰兮,何不渡为。事且急兮将奈何。

芦中人,芦中人,岂非穷士乎?

此歌见东汉袁康所著《吴越春秋》。这部书为半小说体的,所载事迹,我们未敢全信,但此歌尚朴,与《左传》所载春秋末歌谣还不甚相远,姑且算他是真的罢。(《吴越春秋》还载有伍子胥《河上歌》、《申包胥歌》、扈子《琴曲》、《越王夫人歌》、《采葛妇歌》等,皆一望而知为汉人手笔,因此我连这首《渔父辞》也不能不有些怀疑。)

次则《论语》所载《楚狂接与歌》:

凤兮凤兮,何德之衰?往者不可谏,来者犹可追。已而已而,今之从政者殆而!

此歌见《论语》,我们当然该相信。但据近人崔适的考证,则《论语》末五篇之真伪还有问题。内中曾否有战国人窜乱,尚未可定。《庄子·人间世》篇亦载此歌而其词加长,末段有:“迷阳迷阳,无伤吾行。吾行郤曲,无伤吾足”等语,似是从《论语》衍出。